

本期专题·信访工作

- 02 习近平谈信访：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 04 总书记为啥强调信访的“源头”
- 05 “枫桥经验”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经验
- 08 关于信访

政坛经纬

- 11 郑永年：学西方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

警钟长鸣

- 14 常州毒地污染史长达50年 城市规划只字未提

文化漫步

- 17 1989年，胡乔木的信给“汉译名著”保驾护航

历史深处

- 18 军统特务眼中台共两千党员里唯一可称硬汉的是谁

悦读时光

- 封三 哪位中共党员写“檄文”痛骂毛泽东反被毛称赞

编者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稳定是发展的基石。“下大气力处理好信访突出问题，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信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解决突出问题的基本方法，到加强源头治理的明确要求，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怀着深厚的为民情怀，深刻阐明信访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为我们提升信访工作能力水平、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遵循。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信访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社会深刻转型，改革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群众诉求的内容日趋多元多样，表达诉求的方式日趋活跃，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也在提高。从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的信访突出问题来看，既有新动向，也有老难题。面对时代新发展、群众新期待，信访工作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只有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与时俱进，始终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信访工作才能想群众之所想、应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新形势下，解决信访突出问题，需要更加注重综合施策、协同发力，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社会矛盾牵涉诸多方面，成因错综复杂，靠一个部门力量、一种工作方法、一项制度机制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坚持和创新“枫桥经验”，积极主动在基层和源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才能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只有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才能见到实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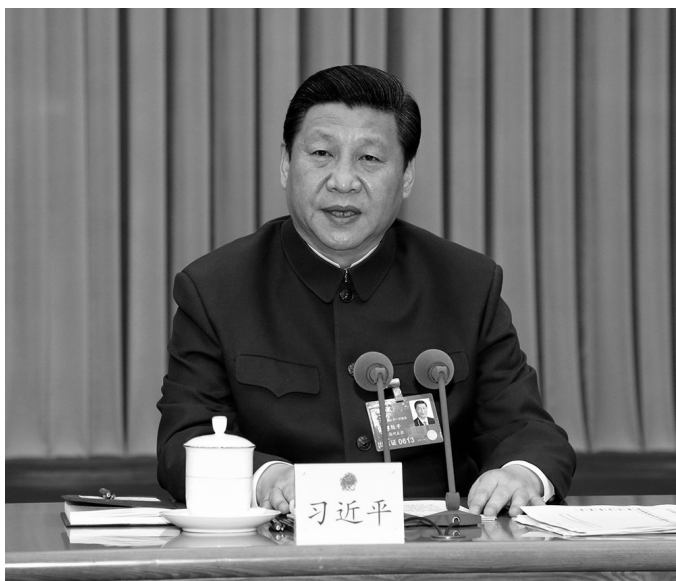
本期推出“信访工作”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习近平谈信访： 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习近平近日作了一个重要指示,事关做好信访工作。

主要强调了几个内容:

1、突出问题:

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的信访突出问题,既有新动向,也有老难题,但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2、如何解决: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综合施策,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3、加强风险研判: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风险研判,加强源头治理,

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

更多内容,看通稿。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做好信访工作,妥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综合施策,下大气力处理好信访突出问题,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习近平指出,当前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的信访突出问题,既有新动向,也有老难题,但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习近平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风险研判,加强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完善解决思路和措施,认真处理信访反映的突出问题,同时注意完善体制机制,努力化解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1604022 学习小组)

文摘:

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

该的。

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在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济助送进普通群众的家庭。

——摘自《习近平在福建:百姓安危冷暖不离心头》一文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汲取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关心、济助”每一个需要关心济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我们提倡各级领导带任务、带问题深入基层,解剖麻雀。通过深入基层,提高领导机关的办事效率,有利于把问题解决在源头,把矛盾消弭在萌芽状态。

——摘自习近平著《摆脱贫困》一书

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主动下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每个领导干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为群众解难。

基层是群众信访的源头,又是解决信访反映问题的关键。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广大基层干部长期处于一线工作,为人民群众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在信访工作中,基层干部应该把好第一道岗。

——摘自《之江新语》一书

(01604022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总书记为啥强调信访的“源头”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信访工作做出指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风险研判，加强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

这是继去年国家信访局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进行信访实地督查之后，中央对信访工作的又一次强调和阐述。专门就此作出指示，有对信访作为目前疏导社会矛盾主流渠道的研判，也表达了基层社会矛盾发酵带来的治理压力。

上述讲话中所强调的“源头治理”很有针对性，一直是信访工作的关键所在。当前的信访制度是嵌套在“向上负责、下管一级”政府体制之中的，它不仅展现着利益受损群体与当地发展诉求的博弈，也展现着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长远社会治理目标与当前维稳目标的博弈，一地稳定与更大行政区域治理的博弈，而在这些冲突中，基层政府多半有偏向于短期目标、偏向于任期内稳定、偏向于牺牲部分群体利益达成决策目标的惯性。所以，信访问题的“源头”，往往扮演着问题的制造者和解决者双重角色。

这种角色上的分裂，常阻碍信访在源头治理中发挥出矛盾疏导的功能。梳理近些年的新闻事件可看到，涉及城市拆迁安置、农村土地征用、以及企业改制损害职工权益等等上访案件，很多都是基层政府粗暴决策或不当治理的伴生物，其中

一些又在酿成公共事件后成为了维稳的目标。近期的常州毒地风波中，维权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家长就曾遭受过有关部门的传唤和询问，被警告“不要惹事上访”，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信访纾解社会矛盾的思路在落地时的尴尬。

在地方规划发展中，部分群体的利益要服从政府决策逻辑；而不服从这种逻辑的上访者，同样要面对信访工作对地方维稳的事实上服从。在“越级走访不被受理”新规出台后，这种尴尬可能会更有强化的趋势。去年几部委组成信访督查组进行实地督查，应该也是充分考虑到了上述情况，意在理顺地方信访工作机制。总书记此次指示中对加强源头治理的强调，是对信访工作的提点，其实更是对一些基层决策上的短视行为和固有治理思路的敲打。

实际上，正如光明网评论员曾论述过的，信访的“A面”是民众的申诉渠道、权利救济渠道，“B面”则是政府自我矫正的低成本手段之一，是开放型政府与民众接触的常规、低成本渠道，地方政府应该从麻烦中看到其建设性的一面。脚是拦不住的、嘴是堵不住的，多少小麻烦都是在长期的压制和封堵中酿成大祸，成为全国性的公共安全事件，最终将地方发展的肘腋之疾扩大成为了心腹之患。这些前车之鉴还不够密集么？

源头治理的责任者，需要多思。

(01604022“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枫桥经验”

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经验

“枫桥经验”产生于一个小镇，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而且成为公认的中国经验，半个世纪以后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对建设平安中国发挥着重要示范作用。

其直接原因，当然是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中央有关部门的有力指导，把“枫桥经验”树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中央两次批转枫桥经验，胡锦涛同志亲自听取了枫桥派出所的汇报，并对“枫桥经验”给予充分肯定，都对“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也对“枫桥经验”精心培育和积极推广，习近平、张德江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从经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出发，多次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

而根本原因，则是因为“枫桥经验”是实事求是的经验，与时俱进的经验，不断拓展的经验，逐渐深化的经验，以人为本的经验。

“枫桥经验”是实事求是的经验

“枫桥经验”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社教运动”中。当时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已经提出，但浙江省委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对待“四类分子”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调查排队，表现好坏以是否守法为标准；省委派出的枫桥工作队敢于实事求是地得出“四类分子”大多数还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结论，而不是以出身和历史作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

在斗争内容上，枫桥集中针对违法行为；在斗争方法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反对用违法手段搞武斗。对重点说理斗争对象在思想上制服后还落实了政策，解决了实际利益问题。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处置，使“枫桥经验”一开始就在实际上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纳入了依法治理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同志肯定“枫桥经验”，党中央批转“枫桥经验”，不仅因为它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为了解决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捕人、杀人过多的实际问题。一年后，党中央肯定推广“枫桥经验”已大显成效，196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而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

浙江省公安厅在推广“枫桥经验”的过程中，还根据当时全省刑事案件中 80%是流窜作案的客观事实，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治安上来，着眼于减少和预防犯罪。这就进一步跳出了“对敌斗争”的思路，从实际出发，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并且从安置失业失学的闲散人口着手来解决问题，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为治本之策，取得了治安状况明显改善的实际效果。这表明正确的思想路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减轻政治路线“左”倾造成的危害，也说明尽管当时“左”的倾向在发展，但也不是一切皆“左”。

“文革”结束后，全国公安战线再次推广落实“枫桥经验”时，枫桥联合工作组又实事求是地肯定当地的“四类分子”在社会动乱年代都表现守法或基本守法，也没有现实危害，应该说是改造好了，遵循邓小平同志当时反复强调的“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决定对已改造好的“四类分子”进行摘帽试点。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前夜作出的这一创举，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突破“左”的思维定势，迅速得到上级党委部门的肯定和推广，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好的范例，也有力地证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党的政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作者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的不断创新，也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实实在在地解决现实问题，使一个小镇能够走在前列，创造出中国经验。

“枫桥经验”是与时俱进的经验

“枫桥经验”的形成和推广，最初是为了消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某些恶果。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其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枫桥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挥发动和依靠群众的优势，着眼于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

盾，维护社会治安，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迅速推进，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社会管理日趋繁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2003年绍兴市委会同省公安厅、诸暨市深入枫桥蹲点调研，又总结出五个推进，五个最大限度的工作经验，即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大限度地畅通社情民意渠道；推进预防化解矛盾工作机制创新，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就地；推进管理理念转变，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最大限度地实现服务阵地前移。从而使新世纪的“枫桥经验”进一步突出了“社会管理重在治本”的战略思想。第二年，“枫桥经验”又融入建设平安浙江的战略布局，为浙江走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列作出了新贡献。

近年来，浙江又结合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任务，发展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寓管理于服务的精细化的新机制。不断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使“枫桥经验”始终具有普遍意义。

“枫桥经验”是不断拓展的经验

从专门解决“四类分子”改造问题，到依法治理、化解矛盾、减少和预防犯罪，到创新社会管理，“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

特别是2004年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策部署以来，全省紧紧围绕“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建设平安浙江的全过程，不局限于治安好、犯罪少，不是仅仅追求表面上的“不出事”，而是以战略眼光建设“大平安”，把建设平安浙江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部署，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

设等各个方面,确定了五个“更加”的总体目标和六个“确保”的具体目标,切实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使各项建设都有助于社会和谐。着力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整合各种力量资源,不断推进基层基础建设上新台阶;着力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坚持依法治理、民主管理,不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广泛开展系统平安创建活动,积极打造平安创建细胞工程,积“小平安”为“大平安”。从而使“枫桥经验”在加快建设全面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枫桥经验”能够对我国各个领域的和谐发展提供启示。

“枫桥经验”是逐渐深化的经验

枫桥经验从对敌斗争的经验,到保持社会稳定的经验,再到促进社会和谐的经验,其内容不断深化。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内容,把化解矛盾作为主要任务,把强化基层作为关键环节,把专群结合作为最大优势,致力于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维护民安、促进民和,创造了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新经验,建立了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新机制,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

特别是近10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思想指导下,跳出治安抓平安,走出了一条民生为本、服务为基、和谐为贵、化解为上、依靠群众、整合资源、精细管理、重视科技的新路子,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并且使平安建设紧贴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好地为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通过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地改善民生,着力创造平等发展、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明显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对社会管理的支持,为建设“平安浙江”提供了根本保证。

“枫桥经验”和平安浙江建设的这一深刻内涵,也能对促进社会和谐提供重要启示。

“枫桥经验”是以人为本的经验

“枫桥经验”一开始就依靠和引导人民群众,注重人的改造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它把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的目标定位于“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生产”,把“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在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同时,又坚持用党的政策教育引导群众,并且把改造的经验归纳为“对症下药,因人施教”、“注重教育,经常考核”、“政策兑现,给予出路”,还提出团结子女,及时摘帽,目的都是化解矛盾,调动积极性。毛泽东同志对总结“枫桥经验”的要求就是回答如何发动和依靠群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推广枫桥给“四类分子”摘帽的试点经验,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把一个巨大的群体从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从丰富发展“枫桥经验”到建设平安浙江,我省各级党委政府致力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注重把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既把平安建设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基本责任,又不大包大揽,积极探索各个层面的民主参与,搭建富有成效的参与平台,积极发挥社会组织、民间力量的作用,通过精细管理贴心服务,夯实平安建设的基层基础,使广大群众既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受益者,又成为平安浙江的建设者,有效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认同感、主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夯实建设平安浙江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共建共享平安浙江。这一切不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而且与这些年来不断强化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高度契合。这也是“枫桥经验”成为中国经验的根本原因之一。

(《今日浙江》 蓝蔚青)

关于信访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信访原则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信访特色

除法律以外的又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利益表达形式。但是，由于信访的有关信息一般要经过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筛选，然后递交给有关领导、有关机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间接的利益表达方式。

产生依据

从中央到乡镇共有五级党政政府（在农村地区有时还包括一级不是政府的政府，那就是村委会、村党支部），城市比农村少一级乡镇政府（直辖市再少一级——地市级），但又多一级“单位”。上下级党政政府之间等级地位森严，各级政府都是下管一级，形成一个层层向下约束、层层向上负责的“金字塔”式的嵌套机制。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其实并不能形成真正的中央集权，除了少数例外，它只能直接管到省、部级，即使是对比如某省某县的拆迁政策进行纠正，也要通过该省，而该省也须通过该县的上一级政府，即地市级党政政府来具体处理，比如将该县的党委书记和县长撤职。

这个制度逻辑，决定了上一级政府总会鼓励民众提起针对其下级政府的上访，但却不希望民众越过自己到自己的上级政府上访。针对下级政府的上

访使得本级政府可以行使约束下级政府的权力，所以上访有时候会对上级政府“赋权”——赋予它管理下级政府的权力；如果民众越过本级政府上访，却将使本级成为上级政府约束的对象——哪怕民众反映的是自己的下级政府，但在上级政府看来，该为此负责的却是本级政府。

这就形成了中国信访制度的一大特色：容许逐级上访，直至上访到中央政府，但反对越级上访。

信访特点

高发地区

在上访者看来，最没有“官官相护”嫌疑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所以，上访的最终目的往往是“千方百计进京城”。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 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 14%，省级只上升 0.1%，地级上升 0.3%，而县级反而下降了 2.4%。另外，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 46%，省、地、县直属部门增幅较少，有的还是负增长 1。

这也造成了一个以北京为圆心的上访高发地域。北京周围的几个省份无一例外成为上访大省。山东某地的法官告诉我，他们当地有几个村庄由于离铁路比较近，民众去北京很方便，被称为“国务院直属村”，一有什么事，村民便乘坐火车到北京上访，让当地政府头疼不已。河北某县由于与北京相邻，到天安门的距离比到省城的距离还近，预防上访、维护稳定便成为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

信访效率

向上负责、下管一级的现行政府体制，也决定了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处理地方事务的足够信息和组织资源乃至精力。中央政府只能管到省部级。面对潮水一样涌来的进京越级上访者，

中央政府实际上难以判断哪些上访者的控诉更真实,而信访者也难以证明自己的问题比别人的问题更重要,需要优先解决。中央政府有时需要派工作组到当地调查,也就是直接获得信息,但实际上中央政府不可能事事都派工作组。只能对下级党委政府考核信访量,从而进入恶性循环。即越是考核量,信访量越大。

不过,对于上级政府来说,上访者所提供的个案材料虽然无法作为直接处理个案的依据,但汇总起来,信访材料还是可以作为发现总体情况的依据。比如,北京市1995年《信访条例》就规定,“综合研究信访情况,及时向本机关负责人和有关部门提供信访信息”是信访工作机构的职责之一。如果中央政府发现,强制拆迁已经在地方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倘若上访者理解了信访制度的这一逻辑,那么,他就会有意识把自己的个案问题普遍化,以期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以此显示问题的严重程度。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2003年时指出:“自1993年全国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出现回升以来,已经持续上升了十年。……其他地区群众来访特别是群众集体上访上升趋势也很明显。”

对于集体上访,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信访条例》并不鼓励。比如国务院1996年《信访条例》规定:多人反映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的,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话等形式提出;需要采用走访形式的,应当推选代表提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2005年新《信访条例》也沿用了这一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各省市自治区《信访条例》也大都沿用了集体上访代表不超过五人的规定。

集体上访的持续增加和日趋严重说明了信访制度又一个错位:上访者的目的是解决个人或群体的具体问题,而上级机关却希望从个别的信访中发现普遍性问题,因为上级机关是政策的制定者,制定或改变政策的依据是普遍性问题,而不是具体问

题。上级机关并不是具体问题的解决者,具体问题的解决仍然要通过下级政府。现行信访制度的设计者希望,普遍性问题能够通过一种个别化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样反映的时候不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太大震动。

上访者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反而容易采取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上访者相信,要使自己的具体问题得到解决或者优先解决,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方式使问题显示出其普遍和严重的一面,而集体上访和反复上访就是一种向政府和社会表明问题普遍和严重的有效手段。一旦一起集体上访的个案得到优先处理,产生的示范效应往往鼓励其他上访者群起仿效。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上访经验的由来。

信访方式

办转信

国务院1996年《信访条例》规定了办理信访的总的原则是“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2005年新《信访条例》又强调“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其中分级负责、属地或归口办理就产生了一个信访机关是以办信为主还是以转信为主的问题。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2003年指出,群众信访问题,“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分级负责”意味着,除基层之外,上级信访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下转信而不是办信。

各省市自治区《信访条例》都对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具体信访职能作出了具体规定,最完备的一个归口管理的规定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问题归口分工处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1991年〕19号通知),其中对党纪、组织、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监察等三十五个方面的信访职责作出了规定。

上级工作以转信为主,这些信访转到基层,基层无法再转,无口可归,有的地方就形成一个以党政领导为主要责任人的工作格局。

“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归口办理”,最终

落实在地方党政领导人身上,专门的信访部门和信访工作人员则负责信访信息上下左右的转送。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信访部门是二邮局”、“信访制度是典型的人治”的诟病。新《信访条例》赋予信访部门更多的协调、督办权,但其以转信为主的功能不会改变。

走访

新《信访条例》列举了信访的形式为“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并处处透出不鼓励“走访”,而鼓励书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狭义“信访”的信息。但是,实际中人们一提到“上访”,想到的却总是千里迢迢的“走访”,要求各级政府要“向社会公布信访工作机构的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尤其是要“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信访事项、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如果这个信息系统建立起来,人们真的就会在家里坐在电脑前“上访”,不用到政府门口、到北京、到天安门上访了吗?

实际上,许多上访者之所以选择“走访”,尤其是“集体走访”、“重复走访”,并非是他们不了解信访部门的联系方式,也并非是他们缺乏通信手段,不会上网,其中的奥妙,无非是在政府对游行、示威严格管制的情形下,“走访”尤其是“集体上访”不过是民众以上访名义进行的游行示威,一种公开施加压力的手段。其他非走访的“信访”,最多只能传递信息,而不能施加压力。没有附加压力的信息,其重要性、紧迫性只会排在附加压力信息之后。

上访者明白了这一点,就越发不会选择最便捷的通讯手段。一封电子邮件是最没有压力的,最不耗费信访部门和领导人的资源,但最节约资源的方式,就是最无力、最没用的方式。与其发这样一封电子邮件,还不如在人气旺盛的网上论坛发一个帖子,有时候还能产生舆论压力,引起领导人的重视。其实最有用的,仍然是集体上访、反复上访。可以预计,即使这套全国信访信息系统建立起来,千千万万的上访者仍然不会去使用。在信访问题

上,光提供方便是没有用的。

新《信访条例》对走访过程中的潜在压力传递机制进行严格管制,规定上访者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不得“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第二十条),试图以此把走访者驱赶到设计好的狭义“信访”的轨道内。但是,即使这样做成功了,没有压力传递方式,如何促动各级官员重视信访?没有压力传递方式传达的事件严重程度的信息,在潮水一样涌来的“信件”、“电子邮件”中,又如何判断轻重缓急?

信访工作

2014年年5月,最高法院制定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远程视频接访规则》,指导全国法院开展远程视频接访工作。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申诉信访人员可以在申诉信访案件的一审法院或者申诉信访人员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表达诉求。

未来转型

理解了现行信访制度的制度逻辑后,我们大约可以对未来信访制度的转型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改变信访向上负责的关键是信访向人大框架转移。信访制度是嵌套在中国现行“向上负责、下管一级”的政府体制之中的。在这个体制没有改变之前,信访制度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信访的功能,不能轻易否定。改变“向上负责”的关键是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如果当地人大能够监督当地政府,由上级政府来监督当地政府的必要性就降低了。所以,将信访与人大制度结合,有利于促进信访制度从向上负责转变为向下负责。并据此在人大框架内进行调查、听证,然后对政府提出监督要求。

不过,这样做需要解决一个法律问题。中国现行信访法律体系由国务院《信访条例》和各省市自治区《信访条例》组成。国务院《信访条例》规定了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接受信访的职权,各省市自治



学西方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

当今国际舆论认为发展的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往哪个方向走？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阐述了他的思考与观点。他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来回答。

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

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开放、包容、改进的学习文明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 13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基本上形成，

区《信访条例》除规定本辖区行政机关的信访职权外，还涵盖本辖区人大、法院、检察院的信访职权，但都是比照行政机关接受信访的模式，由人大内部信访部门负责，而没有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人大代表向下负责、接受信访的模式，只可能通过人大立法建立起来。所以，在实施新《信访条例》的同时，应该把制定《信访法》提上议事日程，并考虑其与《人大组织法》、《代表法》及未来的《监督法》相配套。另外，立法不应是闭门造车，信访向人大转型，最好在北京周围的信访高发区域先行试点。第二，“涉法信访”的增加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司法改革。在于建嵘调查的 632 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 401 位在上访之前曾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占到 42.9%；认为

法院不依法办事判决败诉的占 54.9%。严重地说是一种渎职行为，对此应坚决纠正。另外，中国实行二审终审制，使得不服二审判决的当事人除申诉要求再审外，只好选择上访。要减少由此产生的上访，需要把信访制度与审级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倘若建立三审终审制，则一部分上访将变成上诉。第三，政府应该对新闻媒体的监督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除了要恢复党报群工部接受信访的优良传统外，发达的、竞争性的新闻媒体，会促使专业新闻从业人员对社会热点现象的表现和原因做出深入全面的调查，这就减少上级政府通过群众信访了解总体情况的需求。大量事例表明，新闻媒体的监督，社会舆论的压力，有时候要比主要领导的批示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百度百科）

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从二程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很大,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

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

郑永年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包容性的。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到了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从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当类似宋朝时代。

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面。“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

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这个文明自信心。”

郑永年认为,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 selection 和西方的 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

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吸纳西方为我所用

亚洲价值观是什么?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认为,梳理亚洲价值观。首先,要清楚“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国家形象。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弗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日本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日本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中国变不了西方。

郑永年认为,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步,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

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错误。中国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照搬西方,很多机制都是它们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新加坡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

国家意识形态还未完全塑造 媒体传播需要强大知识体系

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中国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

家意识形态区各有所侧重?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要树立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是什么?既要有中国的传统资源,还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来的传统。复兴国学、传统儒学,都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重造。我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简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两种,一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是共享的价值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国家有共享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由这两部分组成。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三教合一”,中国的文明是学习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要有开放的态度。

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

“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在郑永年看来,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也是一样的。

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还是找现在已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郑永年说,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

怎么塑造软实力?郑永年认为,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



常州毒地污染史长达50年 城市规划只字未提

4月17日，央视曝光了常州外国语学校（下称“常外”）学生异常患病事件，随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舆论焦点的指向是，学生的致病原因是否与仅距常外百米左右的一块“毒地”相关。

最新的消息是，目前常外家长自发统计的学生体检数据又有更新，截至2016年4月20日，已收到683个学生的体检报告，其中体检数据有异常的561人，体检异常人数占比上升到82%。

然而至今，上述焦点问题未得到有关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的回应和解答。这无疑加重了民众和常外师生家长的疑虑，也进一步导致社会舆论的发酵。

中央调查组正在常州进行调查。在定论出台前，不争的事实是——毒地确实存在。经检测，附近的“常隆地块”有毒化学元素在空气、土壤和地下水存在。

那么，求证毒地形成的历史，以及当地政府的城市规划历史，乃至求证土壤污染的整体治理现

状，已经超出了常外学生患病事件本身，它关乎城镇化建设与居民生命健康的现实命题。

跑冒滴漏的“毒地”历史

从地图上看，与常外毗邻的毒地位于原常州市城南工业集中区的天宁区茶山街道，北面中吴大道，南临大通河，西接清凉路，东靠龙游河。这块地，总周长4公里，总面积1平方公里，其中厂区占地面积约0.4平方公里。

上述地域属于太湖流域二级保护区。2000年3月20日开始施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23条规定：“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

在上述地域内，曾经长期存在原常州化工厂（下称“常化厂”）、常州味精厂（下称“味精厂”）、常州化工研究所实验工厂（下称“实验工厂”）等化工企业。

“在工厂搬迁时，我们做过该地的取样调查，

没有中国的故事。

现在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

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

（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研究了该地土壤对植物、鱼类、蚯蚓等生态环境的毒理,试验结果显示对生态有毒性。”2007年,一位曾在搬迁时取样调查的研究人员表示。

“常州化工厂历史上是我国重要的化工和农药厂,其有机化工产品 and 农药生产历史达50年。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产品、原料、辅料等污染物的跑、冒、滴、漏,所在范围内的土壤已受到严重污染,通过实地调查确定了研究区的主要污染物为六六六、苯、氯苯和二氯丙烷。”2011年,一位清华大学学者在取样调查该毒地时已经进行了披露。

上述学者研究的区域,包括常化厂、味精厂、实验工厂三个厂区以及部分居民区,共1平方公里,厂区面积0.4平方公里。常化厂的氯碱厂区于1958年搬迁至该地块,长期生产氯碱及其衍生产物、农药、消毒剂及相关产品,直到2007年搬迁;常化厂树脂厂建于1972年,产品包括聚氯乙烯、聚苯乙烯、环氧系列等有机化工产品,该厂于1994年被常化厂兼并,成为常化厂的一个车间。味精厂建于1962年,主要生产味精、鸡精。实验工厂于1958年建厂,产品涉及化工、轻纺、印染等多个类别的助剂,该厂于20世纪90年代末并入常州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更名为常州化工研究所实验工厂,产品以纺织印染助剂为主。

上述学者的调研发现,常化厂于1958年开始研发、生产工业六六六原粉,先后在氯碱厂区的4个不同地点修建了六六六原药生产车间,其中最老的车间生产时间长达15年。

常化厂的六六六生产车间在生产过程中曾发生六六六原粉泄漏事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化厂的老六六六生产车间曾多次发生过工业纯苯泄漏事故,最大泄漏量不超过10吨/次,泄漏的工业纯苯通过明沟系统直接进入大通河。氯苯是六六六原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常化厂的六六六生产车间在生产过程中亦曾发生氯苯泄漏事故。

搬迁之后的遗毒

虽然常化厂、味精厂和实验工厂于2007年搬

离,但剧毒物质已经进入土壤。

2008年,一篇公开发表在《环境监测和毒理》杂志上的论文描述到,这块毒地的土壤,对不同的动植物存在毒性,且农药厂搬迁场地的土壤污染较为严重。通过化学方法分析了土壤样品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和持久性有机物,结果表明,场地土壤检查的挥发性有机物较多,其中有多种具有强致癌性的多环芳烃类污染物。

2011年,前述清华大学学者调研后,对毒物的监测结果如下:各主要污染物的检出情况为:六六六(9690毫克/千克,调查最大值),苯(1730毫克/千克),氯苯(184毫克/千克),二氯丙烷(1230毫克/千克)等。

“这三种物质在地下7米处,监测到的浓度都很高。六六六在深度为7米的地方浓度远远高于其他采样层位,随着采样深度的增加,六六六检出浓度逐渐升高,直至承压含水层顶板;苯的分布与六六六相似。”这位学者在其论文中描述。

2012年,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莉娜在《农业环境科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有机氯农药污染场地地下水抽水试验》论文,她的研究范围是常州当地的有机氯农药厂。

陈莉娜在电话中拒绝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

在这篇4年前的论文中,陈莉娜表示,试验所用抽水井掘井深度均为20米,72小时不间断抽水。可以看出,整个连续抽水试验过程中,3口井抽出水中检测出大部分场地内存在超标特征污染物,有:六六六(1658微克/升,调查最大值),苯(283000微克/升),氯苯(5620微克/升),二氯苯(3477微克/升),三氯苯(3780微克/升)等。

上述论文亦认为,有机氯农药如六六六在环境中具有高毒性、持久性和生物富集性等特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均具有严重危害。至今在(该地块)环境中仍能监测到不同含量的六六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大量的化工企业搬迁或关停,从而出现大量亟待修

复的污染场地。农药(如滴滴涕、六六六、三氯杀螨醇等)污染场地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类,且大部分场地处于复、混合污染状态,进而增加了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作的难度。

城市规划只字未提“毒地”

常外位于龙虎塘街道,属新北区中心城区建成区。

随着常州新北区的开发,这块有毒区域内的工业企业逐步搬迁,相关区域地块功能调整为居住和商业用地。在这一地域规划的环评报告中,以及环境修复之后,其环境评估都是合格的。

2010年10月,新北区政府提交了《常州市新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送审稿,在这个长达85页的文本中,描述了新北区的未来将是常州市“北部新城”的蓝图,但是这样的一份文件中,只字未提污染土壤修复的内容。

2011年5月31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在南京组织有关专家,对常州市新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成果进行了审查,原则同意通过审查。

常州市发改委在2011年3月,同意了新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在控制建设用地的同时,加大城镇建设用地的内涵的挖潜,鼓励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深度利用,成为当年建设用地开发的应对举措。上述污染之地,也在被挖潜之中。

但2011年3月至5月,新北区政府委托原常州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对被指有毒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和风险评估,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有关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较重,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

2013年8月,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常隆(华达、常宇)地块”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技术方案研究。确定修复技术路线为污染土壤采用“异位—资源化利用+局部区域隔离”的修复方法,即将地下6米以上的污染土壤挖出,利用现有

新型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装置,作为水泥厂原料资源化利用,6米以下采取隔离的措施。污染地下水修复采用“原位化学氧化”的修复方法。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专家陈同斌认为,上述方式不是很合理,富集于地下的有毒污染物,在修复时,会完全暴露出来。

但是,修复方案就这么执行了,而且获得了环评认可。

土壤污染与健康关系界定难题

就在修复过程中,常外患病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

清华大学一位环境科学与工程学者认为,“污染物质的污染程度、暴露途径,接触剂量,环境污染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需要更具有逻辑的科学数据来支撑环境污染与健康关系,但是目前常州缺乏的便是一份更全面的居民健康调查报告。

在缺乏当地居民历史性健康监测数据时,到底如何分析这561人的异常?

“体检异常占体检人数的82%,这个数据是体检人群异常发现率,不是人群发病率。而衡量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应该使用发病率。”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研究员尚琪告诉本报记者。

通常情况下,学生的疾病和健康症状如果与环境污染相关,学生人群会表现出疾病表现和症状的共同性,以及发病时间的聚集性等特点。简单来说,即发病者的临床和症状表现相似,并在一个相近的时间内相继发生类似的疾病与症状。“由于我们现在的环境健康技术水平很难把这些健康问题与环境中的污染物关联起来,因此还需有对照人群的数据进行对比,来观察学生中各种疾病和症状的发生是否异常。”尚琪说。

“环境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的判定是个严谨的科学问题,需要依据周密的调查设计,并获取充分的现场调查数据,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才能给出结论。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时即使如此,也会得不出明确的结论来。”尚琪表示。

1989年，胡乔木的信 给“汉译名著”保驾护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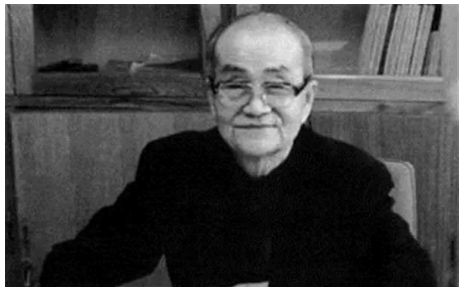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丛书”），源于1958年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翰伯领导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规划的书目，以单行本陆续印行。陈翰伯被商务人公认为这项事业的奠基者。改革开放后，在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主持下重新规划，以系列学术丛书于1981年启动、1982年出版第一辑50种，按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语言学五类，分别以橙、绿、蓝、黄和赭五色在书脊标明。经几代学人和出版人共同努力，现已出版十二辑500种。这套译丛，经有序扩充而成为以外国古代及近代为主兼及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外的哲学社会科学代表著作译丛。所收各书的作者大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归纳者、宣传者和创造者，反映了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的精神世界（陈原语）。由此，“汉译名著丛书”被誉为借鉴和吸收外国有益学术文化的基础性重大出版工程，是商务印书馆享誉中外的著名文化品牌。

这套“汉译名著丛书”的编选与出版得到胡乔木的一贯支持和精心指导。据陈原回忆，胡乔木看到1982年出版的“汉译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后，“显得很高兴”；一年后得知第二辑正在印制时说：“这样就好，要认真真地去做”。

在胡乔木看来，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是一件

大事。1984年3月14日向邓小平汇报思想工作时也不忘谈及此事，说很多世界学术名著我们都没有翻译出版，可考虑在美国设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从事这项工作。邓小平表示赞成：“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邓小平年谱》下集，第966页）

胡乔木对“汉译名著丛书”的出版进度更是挂在心上。1991年11月28日写信给陈原：“商务近年所出汉译世界名著，很久没有收到过，请告商务将有关目录寄来，以便圈选索要。”《胡乔木书信集》收此信时，编者加注：“应胡乔木要求，商务印书馆总编室给胡乔木分批送去汉译世界名著目录。汉译世界名著因有些书已售完，没有送全。”陈原在回忆时说：“对此，我至今引以为憾。”



胡乔木（1912-1992）

据我所知，胡乔木对“汉译名著丛书”比较系统地讲过两次意见。

一次是1984年对陈原讲的。

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在北京香山召开有著名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泛谈学科的趋势和出书的设想。会前，胡乔木就“汉译丛书”选材方针向陈原讲了意见，经陈原整理送胡乔木过目，他还作了修改，但嘱不要说是他讲的，听听学者们的反应再作修改。我应陈原之邀，参加了这次香山会议，了解一点实情，陈原在会上讲时又有所“暗示”，学者们也有所“察觉”。据陈原著文回忆，胡乔木此次所谈主要内容有：古典名著，世有定评，为数不多，应尽量把内容重要而未译出者列入规划；“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主要为18、19世纪）的著作，品种较多，宜选择学术性较强对社会发展起过作用的代表著作，也可选择一些学术性虽不强但资料丰富的著作；本世纪西方和日本（东方）各派学术著作，为数更多，选择更要看重学术性；要注意选择一些大学问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罗素的书译出不少，还应译出他的三卷本《数学原理》）；要努力写好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的译者序言，其中包括作者生平，主要贡献，本书的学术地位和作用，不足之处和局限性等的分析评论。（《陈原出版文集》第424—427页）

另一次是1989年12月4日对商务印书馆召开“汉译名著丛书”规划座谈会的祝贺信：

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编辑部：

祝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编辑出版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译校编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值得全国学术界、知识界和读者的深切感谢。

现在希望这次召集的座谈会将对过去的工作作出恰当的评价，对今后进一步发展这一工作的计划进行广泛深入无拘束而有成果的讨论。个人意见，选题的范围还可以更广些（例如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重要社会运动、重要民族运动的历史和现代研究，重要历史著作，各门学科史著作和科学基本理论著作，各种艺术史著作和艺术基本理论著作，外国对中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的权威著作，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等等，有待介绍的著作很多很多）；翻译者可以不限于国内；台湾香港等地已有较好的汉译名著可设法出版；国内亦可以考虑由几家出版社经过协商联合出版，以利事业的推进而免工作的重复；如情况许可，可出普及版（甚至缩写版，但要有严格限制，以免粗制滥造）；为了推进这项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建议由国家设立基金和保障奖励制度。当然，提出这些建议很容易，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但是说说或者比不说好，姑且写出，权当贺礼，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也。

祝到会的各位学者、专家、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活动顺利！

胡乔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据胡乔木手迹复印件排印）

1989年冬，是在北京政治风波之后，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正处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涉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高潮中。“汉译名著丛书”屡遭质疑和责难。

1980年代启动时，就有人告状，说商务“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在1989年反自由化中继续规划出版时，用分管其事的副总编辑的话说，恰似“荆棘载途，形格势禁”。1989年11月2日，商务特向其主管机关新闻出版署报送长篇请示报告，详尽说明“汉译名著丛书”的编辑缘起与进一步规划的必要，会议的指导思想与解决的问题，该说的政治原则都说了，该划的思想理论界限都划了，最后以早日实现小平同志用几十年时间完成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的设想结束报

告。新闻出版署对商务此举是赞成和支持的。我认为，即使在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背景下，也要遵循党的批判吸收一切有益文化的一贯方针，还要考虑这类学术著作所反映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观点同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区别的，解决的政策和方法也是不同的”（转引自拙著《亲历出版三十年》第292页），主要在实施中适当选择和写好序文，因而批准了商务的报告。

为开好这次会议，取得胡乔木的进一步支持十分重要，我和陈原分别给胡乔木写信，向他汇报召开西山会议事，请他亲临指导，或对会议作出指示。胡乔木体察下情，适时发出祝贺信。《胡乔木书信集》编者收入此信所加注释说：“胡乔木一直很为关心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曾多次就商务出版学术名著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问题，系统地作过指示。1989年冬，胡乔木正在外地视察，当他得知商务印书馆要在山西（笔者注：此处有误，应是北京西山）召开有许多学者参加的汉译学术名著长期规划会议时，立即写了这封情词恳切的贺信，表达了对长期规划的意见。”（《胡乔木书信集》第779—780页）这封信反映了胡乔木对编选出版“汉译名著丛书”的一贯思想，更说明他对“汉译名著丛书”的支持与指导不因国家政治形势发生某种变化而改变。西山规划会开幕那天（12月5日），中宣部副部长李彦、龚育之和我都出席并讲话，代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对会议和这套大书编译出版表示支持和祝贺。我强调，胡乔木信对“汉译名著丛书”的选题规划和出版方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落实中有什么困难，“就由我们来协调”；要像胡乔木信要求的那样，以百家争鸣的精神，对规划进行“广泛深入无拘束而有成果的讨论”。胡乔木信受到与会学者热烈欢迎与好评。“无论大会小会，学者们开门见山，各抒己见，讨论非常融洽”。（商务《汉译名著丛书规划座谈会纪要》）会议是开得成功和圆满的，为充实和调整规划取得了建设性成果。应当说，在当时

情况下，胡乔木充分肯定“汉译名著丛书”“在编辑出版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称赞“汉译名著丛书”是“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选题的范围还可以更广些”及所列各个方面，“译本要有较好的序言”，在翻译出版等方面注意发挥港台及海外的力量和资源，由国家设立基金和保障奖励制度等，都对会议以及其后实施中的统一思想、排除各种思想干扰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结束后，即1989年12月15日，新闻出版署就通过《新闻出版要情》，以《胡乔木同志对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提出重要意见》为题，将祝贺信全文报送中央。

“汉译名著丛书”启动初期，重点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著作（有时也成为应对质疑和责难的盾牌），遵照胡乔木和学术界的意见，选题逐步有所拓宽：（1）下线放宽到第二次大战之前；（2）加强东方世界如印度、日本的名著译译；（3）扩充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语言学 and 某些边缘学科及科学哲学名著；（4）继续加强序跋、索引和注释工作。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在2009年，为庆祝建国六十年大庆，隆重推出“汉译名著丛书”珍藏版十辑400种，获得学界高度评价。此后又以珍藏本为基础，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500种，分科出版，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商务还制订了“汉译名著丛书”2000种长远规划，争取在2020年前完成。

写到这里，应当说，“汉译名著丛书”取得今日之辉煌，是数以千计的相关学者和出版人对我国思想理论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已经辞世的胡乔木、陈翰伯、陈原等前辈最好的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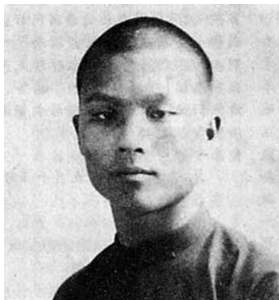
2012年2月

（中华读书报 2016-04-22 作者为文化部原副部长，原国家出版局局长、新闻出版署署长）

军统特务眼中台共两千党员里 唯一可称硬汉的是谁

核心提示：谷正文认为，在台共党员两千余人中，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张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

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被捕



张志忠 资料图

后，坚贞不屈。一次，蒋经国亲自到监狱里劝降张志忠：“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干脆地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原台湾地

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在“二二八”事变后前往大陆，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他在回忆文章中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长期调查核实，于1999年1月将张志忠和夫人季云定为烈士。谷正文对张志忠的评价甚高，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

谷正文认为，在台共党员两千余人中，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失去领导能力。张则坚持其武装斗争作风，搜罗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处武装基地。此作法为中

共中央所否决，认为台省山林不深广，交通又方便，不宜游击战。张与蔡不和，四人先后被捕后，蔡、陈、洪皆投降，唯张一人不降，虽多方诱导，但坚持一死。后蔡、陈、洪全为保密局聘为‘匪情研究室’研究员，张则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以及“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四人在台北近郊马场町英勇就义。吴石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临刑前，吴石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后半部分为：“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民政部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朱枫就义时，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她的颈上和肩头，是一道道勒紧的绳索。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身中7弹，英勇就义，时年45岁。这一案件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第一大案，震动了整个台湾岛。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由于多种原因，朱枫烈士的骨灰长期流落台湾。2010年12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协助和台湾有关方面的配合下，朱枫烈士的骨灰终被迎回大陆，寄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被送回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朱枫烈士灵堂。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第02期，作者：何立波，原题：1950，叛徒蔡孝乾与台湾地下党，本文系节选）